

坚持党的领导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郭忠義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习近平总书记任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党的领导，巩固文化主体性，回应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要求，把文化传承发展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谋划，确保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支持文化研究阐释，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以组织协同和长效机制保障群众持续参与，使文化传承发展形成方向明确、运行协调、持续发展的工作格局。

把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正确方向。文化传承不是对历史材料的简单保存，而是包含价值判断、意义阐释和时代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阐发什么内容、弘扬何种精神，都需正确的思想方向和价值尺度。党的领导首先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文化传承发展始终服务于培育时代新人、涵养社会风尚、增强民族认同。“第二个结合”打开了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新空间，为认识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方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在尊重历史事实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辨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时代价值，防止片面复古和简单符号化。对于涉及价值取向的重要文化议题，应坚持正确导向，为专业研究和社会传播确立清晰的原则边界。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处理好古与今、继承与创新、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文化传承发展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并不断形成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文化表达。

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积累，

形成了丰富的典籍文献、思想观念、礼俗制度和艺术样态，其时代价值需要建立在扎实研究和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文化资源的整理与文化意义的阐发相互关联，但二者在工作方法上各有侧重。历史文献的校勘、民间文化的记录、地方文化的调查，应尊重专业规范，尽可能呈现材料的原有面貌；面向公众的阐释，则需要在可靠史实基础上说明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意义。党的领导明确研究阐释的公共文化使命，为长期性、基础性研究提供稳定支持，协调科研机构、文化单位和地方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同时尊重学术研究的专业规范，形成成果持续积累、合理共享和有效转化的条件。围绕重要典籍和相关的地方文化资源建立跨学科研究协作机制，减少资源分散和重复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智慧要联系当代实践作出审慎阐释。例如，对家国情怀、讲信修睦、和合共生等思想资源的理解，应注意其历史语境以及今天的价值表达，使文化阐释既有历史依据，又回应社会现实。还应重视地方性文化知识和群众日常文化经验，推动专业研究与基层文化调查相互补充。建立内容审核、学术论证与反馈机制，维护文化表达的准确性和公信力。只有打通资源整理、学术研究和公共阐释之间的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以更清晰、更可信的面貌走近社会。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落实这一要求，要把文化传承从单一的知识传播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场域。公共文化服务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供给，使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成为连接历史文化与当代生活的重要空间；学校教育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认知特点，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和校园文化；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生产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具有时代价值的题材、意象和精神资源，形成更具

感染力的现代表达。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条件，但技术运用应服务于文化内容和价值表达，要避免片面追求形式新奇和传播流量。还应重视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形成多样化表达方式，提高文化供给与生活需求的契合度。党的领导明确文化供给的公共价值导向，推动文化机构依据群众需求调整内容与传播方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日常生活、公共空间和社会交往。

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体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最终体现在人的认同、参与和创造之中。文化传承发展既需要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等专业力量，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广泛参与。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充分联系群众和凝聚共识，使专业文化力量与基层社会力量形成相互支持的传承关系。应发挥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的优势，把文化传承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群众性文化活动结合起来，为群众参与文化创造提供稳定渠道。对传统艺术、地方文化和民间文艺，要重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人才和青年群体之间的衔接，增强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同时，要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支持文化社团、志愿组织和基层文化能人参与传承实践，使群众既成为文化成果的共享者，也成为文化传承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完善文化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为长期从事文化研究、传播和实践的人才创造良好环境。只有把文化认知转化为文化认同，把文化认同转化为自觉参与，把广泛参与转化为持续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融入现代生活。

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组织协同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涉及研究阐释、教育普及、公共服务、文艺创作和社会参与等多个领域。不同工作各有专业规律，也需要形成目标衔接、资源互补和责任清晰的协作关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将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任务纳入相关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安排，推

动宣传、文化、教育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对跨部门推进的事项，关键是明确主责单位、协同方式和工作边界，避免同一资源的重复开发。对公共文化机构与学校、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的项目，应明确牵头责任、合作规则和信息共享方式，减少协作中的责任悬空和重复安排。基层党组织要熟悉本地文化传统和群众需求，在组织协调、议题协商、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桥梁作用，但具体文化内容的生产与评价须尊重专业规律。对涉及多地区共享的文化资源，要兼顾资源所在地的保护要求与公共使用需求。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支持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需要建立与工作周期相适应的投入机制。基础研究和典籍整理需要更长的时间，群众性文化活动更重视持续参与，不宜采用完全相同的评价尺度。应把文化传承的长期性要求落实到政策支持和督促中，根据不同类型工作的实际需要合理确定支持期限、阶段任务和成果使用方式，使经费安排与人才培养、设施运行及内容更新相互衔接。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实施成效的跟踪评估。评价文化传承工作，既要了解文化资源利用、服务覆盖等运行情况，也要关注内容质量、公众理解和长期参与，避免重形式轻内容、重活动轻积累等问题。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应依托责任督促和反馈制度推动相关单位改进服务内容与支持方式，形成持续改进的运行机制。成熟项目可建立长期合作安排。对于群众反映集中的服务短板，应把需求调查、项目调整和效果反馈连接起来，使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目标落实到可感知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把牢文化传承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阐释、促进文化融入当代生活、凝聚文化传承力量，需建立稳定的组织保障与协同制度。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各方面力量持续汇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共同事业中，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

李一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重塑文化生产、传播、应用的方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带来新机遇。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建设，要从健全机制、优化内容、创新传播、强化保障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人工智能+文化”融合发展，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注入数智动能。

健全机制体系，把牢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正确方向。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化”内容规范机制，明确人工智能产出文化作品必须恪守意识形态要求，

划定其创作的价值红线，从源头上树立“人工智能+文化”生产的评判标尺。健全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化”内容审查机制，针对人工智能容易生成的低俗猎奇、泛娱乐化表达、歪曲历史叙事、恶搞英雄模范、虚构信息等不良内容，依托现有智能内容管控技术，严格落实各类网络平台内容发布审核主体责任，及时识别、拦截和处置违规内容。健全多方力量协同参与的治理机制，统筹文旅、媒体力量，完善信息研判、风险预警、问题处置的闭环流程，形成多部门协同、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

优化内容供给，夯实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价值根基。深入挖掘贵州红色资源，系统梳理相关资料和英烈事迹，将其融入“人工智能+文化”作品创作，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区分不同群体认知特点和接受习惯，开发差异化数字文化内容，推动价值引领精准化、具象化、生活化。引导各类文化创作主体把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所承载的社会公德、时代新风融入人

工智能创作，推出更多弘扬主流价值、彰显时代新风的数字文艺作品。充分发掘民族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具有贵州辨识度的数字文化产品。搭建AI前置内容审核机制，对各类数字文化产品做导向筛查，从源头规避不良内容风险，牢牢守住主流价值传播底线。

创新传播形态，拓展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传播空间。打造沉浸式“人工智能+文化”体验场景，依托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博物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开发建设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全息投影、AI互动等项目，借助人工智能增强群众文化体验感。深化数智文旅融合发展，依托“一码游贵州”平台，开发智能行程定制、AI虚拟讲解、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等功能，把数字文化内容融入民族村寨、红色研学等旅游线路。搭建多媒体传播矩阵，综合运用短视频、互动直播、AI数字人讲解等形式，拓宽传播渠道，扩大主流文化的传播范围。探索文化对外传播新路径，将贵州民族文

化、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对外传播的数字产品，推动贵州故事走向世界。

完善保障体系，筑牢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长远支撑。建立“人工智能+文化”交叉培养机制，推动省内高校、职业院校优化课程设置，开设文化与人工智能实训课程，强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实训课程，强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实训课程，强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实训课程。完善“人工智能+文化”作品评价激励政策，坚持把社会效益、群众反馈作为核心评判标尺，建立项目评审、跟踪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对价值导向正确、凸显贵州文化特色的“人工智能+文化”项目给予政策和资源扶持。完善紧缺人才引进政策，重点引进文化策划、人工智能内容开发等专业人才，带动本土文化队伍提升业务水平，整体增强全省“人工智能+文化”创作能力。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曾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层治理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基层治理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对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深刻认识基层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是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现实依据。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进入新发展阶段，内外形势之变、科技创新之变、

社会结构之变交错演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新期待。基层作为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基层汇聚着我国最为庞大的人口群体，呈现真实复杂的社会百态；作为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基层既是各类矛盾问题的集聚地，也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关键场域；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能否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社区组织形态更加丰富，“三新”领域蓬勃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应用，对加强基层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基层治理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

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坚持政治引领，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基层党组织是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减负赋能，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统筹减负和赋能，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持续发挥驻村工作队作用，推动基层治理和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党建引领才能整合各方面力量，服务基层治理，将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最大优势就是发挥党建“领”的力量、

“统”的作用、“聚”的功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

坚持服务群众，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必须始终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要持续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解决好就业、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民生问题。纵深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稳固的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黔西南州册亨县纳福街红旗村民间文艺队表演布依八音坐唱。 叶方杰 摄（影像贵州）

◆理论宣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理论宣传上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照本宣科、不求甚解、浮在面上的多，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入脑入心的少。理论宣讲的困境，不是听众不来，而是来了、听了、点了头，回去之后一切照旧。从“讲清楚了”到“听进去了”，中间隔着什么？宣讲不是自说自话，理论不能悬在半空。道理要让人受用，话要让人爱听，就得回到具体的人和事里去。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而叙事，正是理论通向群众内心的那条路。

叙事：打通认知走向认同的中间环节。叙事何以动人？它需要打开三道关。认知关。抽象理论像隔着毛玻璃看风景，轮廓在，细节无，而叙事则是将窗打开。宣讲者如果简单地以人民为中心，听众听了不见得入脑入心；但讲黄大发三十多年凿渠的故事，听众眼睛亮了。故事把人民还原成了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听众不是在受教育，而是在经历。情感关。情感上的认同，比理性的接受牢靠得多。好故事让人同喜同悲，听众为故事中的人物揪心、感动、振奋了，“共情—认同—内化”的链子才算真正启动。没有这道关，价值只是空中楼阁。黄大发说“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让每个人不自觉地想：换了我，做不做得得到？这种冲击，比任何说教都直接。意义关。故事不是信息的堆砌，是价值的排序。主人公在“两难”中做出选择，本身就是一次无声的价值教育。当听众心里说“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或“为什么我做不到”，理论就不再是外部要求，而是内心的声音。

实践：一方水土养一方叙事。叙事不能“拿来主义”。最有力量故事，一定长在听众的认知半径之内。理论宣讲面对的是基层群众，道理要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才能走进人心，把鲜活的理论讲鲜活。党的二十大以来，贵州创新开展“理论宣传二人讲”，一人讲理论，一人讲实践；一人摆事实，一人讲道理。理论员的严谨叙事与实践者的鲜活叙事相互印证，实现“1+1>2”的效果。贵州大学采用“一名专家学者讲理论、一名先进典型讲实践”的互动形式，构建了“示范带动、基层推动、青年联动”的三级宣讲队伍体系。听众需要什么就讲什么，从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参与，宣讲也从“单向灌输”走向了“双向奔赴”。宣讲不再是台上念稿、台下听讲，是有理论高度、有实践温度的思想对话。警示教育同样不能少。用好反面案例，如“我当初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穿透力极强。它把违纪违法还原成一个人面对诱惑时的真实挣扎。听众会追问自己：“如果是我呢？”这个追问本身，也是一次深刻的自省。正面典型树立标杆，反面案例标出底线，构成完整的价值参照系。

进路：三个维度重构宣讲逻辑。叙事何以动人？选好素材。贴近性——离听众越近，穿透力越强；价值性——故事必须有鲜明的价值导向；真实性——过度包装反而让人生疑。对机关干部侧重两难抉择型故事，对基层群众侧重命运改变型故事，对青年群体侧重大成长励志型故事，对高校师生侧重使命担当型故事。不同群体，需要不同的叙事“药引子”。讲好故事。叙事应遵循“情境铺垫—冲突呈现—选择时刻—结局回应”的底层结构。切口要小，思路要新，位置要准。细节是叙事的生命，少了细节，道理立不起来。同时创新叙事方式，把“宣讲+文艺”“宣讲+故事”等结合起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创设情境。叙事不能止于单向讲述，必须走向双向互动。例如，贵州大学设置六个专题学习组实现破壁联学；贵州理工学院把警示教育课堂搬到法庭现场；贵州民族大学打造“书记校长有约”面对面平台。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让受众不再是听故事的人，而是参与故事的人。

听完故事之后那一句——“这个故事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在类似情境中会怎么做？”才是理论宣讲的“最后一公里”。这一步走通了，理论才能真正从入耳到入心。道理要让人受用，话要让人爱听，群众坐得住、听得懂、记得牢，理论宣讲才算真正落了地。让叙事从远方回到身边，从抽象道理回到鲜活故事，理论便不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化作推动工作的动力。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